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毕生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而努力奋斗”

□ 刘东庆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外交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乃至整个世界局势演变均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和直接参与者，基辛格先后5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并深度交流。毛泽东强大的领袖魅力令基辛格极为叹服，印象深刻。自1971年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来，基辛格访问中国近百次，为增进中美两国友谊和人民生活作出历史性贡献，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外交的常青树”。基辛格著述颇丰，他撰写的《论中国》《白宫岁月》等著作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成为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和中国社会的“异域之眼”。

“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普通民众眼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毛泽东有着怎样的性格和爱好？经过有色眼镜的层层过滤，在中美交往大门正式开启以前，这些问题对美国人民而言始终是雾里看花、不明究竟。带着这些疑惑，基辛格在1972年陪同尼克松总统踏上了访华的行程，首次见到了毛泽东。

令基辛格颇为惊讶的是，作为一位世界大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保持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习惯。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会客室内简单朴素的陈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四周书架上、桌子上、地面上都摆满书籍，房间角落里摆放着一张简易木床，沙发上套着棕色布套。整个房间的陈设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毛泽东以强大的意志力克服了因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的困扰。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他身材魁梧高大，脸上常带微

笑，眼神锐利，仿佛一眼就能识透人性的弱点和虚伪。当他一露面立即就会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他无需依靠过分的排场以显示威严，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同样令基辛格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别具一格的谈话方式。他的谈话完全脱离繁文缛节，让人感到轻松自如、富有哲理，往往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表达真意，间杂穿插几个玩笑活跃气氛，表面上看似好像偏离主题，但始终聚焦中心问题。总的来看，毛泽东有着高超的谈话艺术，既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又收放自如，“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顶尖的谋略家”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被动挨打的局面，难以在国际事务中替自己发声、捍卫自身权利。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基辛格十分感慨地说：“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比其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

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并将其作为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经验来源，从中汲取灵感并发挥到极致。他善于唱“空城计”，出奇制胜，令对手摸不着头脑进而举步失措。他分析力量对比、掌握力量平衡，使敌对势力相互牵制，然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面对挑战时毛泽东敢于反击，但当形势不利于己时他会灵活地变换策略。毛泽东在外交中，十分娴熟地借用传统手法，“立意大胆”，是“顶尖的谋略家”。

毛泽东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时从不固守刻板礼节，善于以象征性的举动向对方传递明确信号。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登上天安门，几人的合影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对毛泽东这一做法蕴含

的深意，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错失了与中国接触的机会。后来基辛格不无遗憾地表示：“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毛泽东仍然高度关注国际局势并随时准备调整策略。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先后4次接见基辛格。1973年2月、11月，毛泽东与基辛格两次见面长谈，详细阐述了他对“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构想。基辛格认识到：“在政策执行上，毛泽东可以相当务实；在政策构想上，他总是努力抓住大原则。”1975年10月、1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两次谈话，尽管深受疾病困扰，但他仍显示出“无比坚定的意志力”，表达了“与一套复杂的战略意识相抗争的革命信念”。

“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

在多次交往的过程中，基辛格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立场的不懈追求，具有“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告诉基辛格，面对外来侵略，“不论其他国家会怎么做，中国即便是其军队必须撤至内地打游击战也要抵御外侮”，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歼灭敌人。

在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基辛格感受到，在合作对话的每一阶段中方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在哪种情况下中国都不会仰赖其他国家的决定”。这方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1973年11月访华结束前，基辛格提议可以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通一条热线以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提议触碰到了毛泽东敏感的红线，引发他的激烈反应：“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在毛泽

东看来，中美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平等的，舍此立场便无合作可言。

面对外部核威胁，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将凭借自身的力量准备以“小米加步枪”抵抗到底。或许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基辛格起初对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未能完全理解，但随着交往的加深，他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以文化优势或幅员辽阔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篑的事例。”

“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扫除了源自传统的牵绊，“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是“自中国统一以来第一位奉行消灭旧势力、打破旧传统的执政者”。

毛泽东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相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穷力量，认为只有依靠中国人民才能夺取事业的胜利。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理念影响极为深远。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成就依靠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以及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

此外，毛泽东重塑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国追求现代化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他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挥斥方遒，在不同势力的此消彼长、动态演变中把握时机，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进，“让中国参与到了一个个交汇错综的地缘政治圈中，却又不受其束缚”。

在基辛格的视野中，毛泽东是一位雄才大略、极为睿智的历史巨人，“毕生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而努力奋斗”。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逆转了近代以来由盛转衰的趋势，恢复了昔日的大国地位与历史荣光，“逐步发展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强国”。



兴国烈士陵园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占地30亩，由悼念广场、烈士浮雕墙群、烈士英雄长明灯、烈士悼念卧碑、革命烈士纪念馆、英名碑廊、纪念亭、纪念池等组成。走进园内，有一面长长的英名碑廊，上面镌刻了23179名兴国籍烈士的名字，在碑廊的起始端，“烈士英名廊”五个贴金大字下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兴国县革命烈士英名碑，铭刻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中英勇牺牲的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名兴国籍烈士的英名。

兴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军民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苏区兴国县二十三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九万多人参军参战，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亲自授予“模范兴国”的光荣称号。兴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贡献殊多，牺牲巨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数以万计的优秀兴国儿女，为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和保家卫国而南征北战，血洒疆场，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千古流芳。更有成千上万无名英雄，默默奉献，长眠沙场，他们的牺牲精神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更值得我们永誌不忘！

为褒扬先烈，让烈士的英名永驻人间，激励子孙万代，继承先烈遗志，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万众一心，奋发努力，去完成先烈们未竟的宏伟事业。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八十周年之际，重建此碑。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兴国县委员会
兴国县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碑文行文朴实，凸显了褒扬英烈、激励后人的立碑主题，概述了兴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的重要地位，高度赞扬了兴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兴国县是中央苏区发祥地之一。1928年12月20日，兴国工农武装举行暴动，革命红旗插上了兴国城。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首次来到兴国，并在这里指导革命发动群众。后来，兴国成了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中共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重要领导机关的驻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里，先后创办了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总医院、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印钞厂，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主战场就在这里。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决定诱敌深入，将兴国地区作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7月10日前后，主力红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回师兴国。7月28日，抵达兴国，兴国人民听说红军返回苏区后，竞相奔走相告，欢迎主力红军。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指挥主力红军穿越敌军赵观涛部和蒋鼎文部之间的空隙，6日抵达兴国莲塘地区，对敌47师谭子钧旅实施了包围，并于7日上午全歼该旅，在莲塘打了第一个好仗。

莲塘战斗结束后，红军乘胜向良

烈焰铸就『兴国红』

——兴国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廊碑文敬读

□ 唐仁焕

村前进，遭遇国民党增援部队及郝梦龄部两个团。红军一鼓作气，消灭其两个多团和两个辎重队，又取得了良村战斗的胜利。此后红军兵分两路，一部佯攻龙冈，主力挥戈东进至黄陂，并于黄陂歼敌4个团，至此红军三战三捷。国民党军精疲力竭，于9月初全线撤退。毛泽东、朱德抓住战机，指挥红军全力反击，先后于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对敌发起攻击，并取得了老营盘和方石岭战斗的胜利。至此，红一方面军以六战五捷，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扩大红色苏维埃，兴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加红军。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目标，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扩红令一出，兴国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了“红五月”扩红突击计划，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组织了万余名青壮年参加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和兴国模范师。1933年6月1日，兴国模范师5000余人在篲箕窝红军广场举行誓师大会，陈毅代表中革军委向兴国模范师亲手授予军旗，并宣读了贺电。苏区领导机关在贺词中称赞兴国“是全苏区的好模范”。兴国不仅是扩红的模范，而且在支前参战、慰劳红军、优待红属、推销公债、支援粮食、合作社运动、节省运动、文化教育、生产运动等方面也获得了模范称号。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他还为兴国亲笔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

为了捍卫红色政权，无数优秀兴国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23万人的兴国县，9.3万人参军参战，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多达5万余人，他们用生命的烈焰铸就了永不褪色的“兴国红”。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党史上的第一所行政学院

□ 曾鹿平

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所行政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改革创新精神，为发展特色鲜明的现代高等教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实践。

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并管理的唯一高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创建于1940年7月1日，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兼任院长，目标是为边区政府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干部。这是当时唯一一所由边区政府创建并具体管理的高等院校，其他高等干部院校均由党中央直接创建与管理。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成立后，初设行政、财政经济、法律三系。另设普通科，学习期限为一年。1941年夏，学院设立法律本科班，同年秋，本科班并入延安大学法学院。1942年下半年，学院分设四系，即行政系、司法系、教育系和财经系。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就改进边区教育作出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作为边区政府设立之大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仍命名为延安大学，学校设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行政学院院长由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署行政专员强晓初担任，其教育、财经、行政、司法四个系的主任，分别由陕

甘宁边区政府相关厅的厅长和法院院长兼任。1945年10月，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迁往东北继续办学，创建东北大学。至此，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在延安的办学历史结束。

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行政学院与延安其他干部高等院校一样，坚持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德育为先、学以致用教育理念。在课程开设方面体现“三为主”特色：即学习方式以组织学习、复习和讨论为主，开设课程以理论政策课、专业政策课、文化课等公共课程为主，各专业课程则以自主编写教材为主。1942年3月，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行政学院的办学方针。具体规定如下：一是学习科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是学习科目要与现实沟通；三是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这次会议还根据以往教学经验与学校工作的实际情况，讨论了该院的办学方向，遵照“学的即用的”这一原则，强调在学习期间，应特别注意整理实际工作经验，毕业后，学校还应承担学生实际工作的顾问，教员也要参加县、区、乡的实际工作，搜得研究工作的实际材料，使行政学院成为边区行政工作的研究机关。课程设置既注意了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又注意了陕甘宁边区的实际需要，目的就是培养“留得住、用得

上、下得去”，适应边区各级政府需要的各类行政干部。

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办学的历史并不长，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才，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学用一致。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中，注意实际工作经验的整理和总结。师生通过参加边区县、区、乡政府有关的工作，搜集和积累实际材料，进行研究，编写有关财政金融、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规程、教材以及中小学课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司法、教育、行政等实践工作的总结和研究，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解决了边区实际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形式办学。行政学院始于战争年代，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单纯地以一种固定模式来办学。于是，行政学院开办了多种形式的培养模式，开设了培养边区县、区、乡级干部的具有相对固定期限的正规班，以培养财政、税务和教育干部为目标的专业训练班以及培养征粮人员为目标的专业训练班。正规班特别强调政治课、专业课。而对于专业训练班和临时训练班，则更多强调实际业务能力的培养，重视实际工作中经验的交流和总结，学习党的基本政策。

教学模式独特。行政学院的教